

探秘“地下”失传医方

自20世纪以来,带有神秘色彩的考古中陆续出土了一批医学文物,尽管古代医学有其局限性的一面,但医学史的发展同样从中获益匪浅,出土文献中有些记载内容甚至仍应用于临床。

**2013年
老官山汉墓
古人脉搏慢体质更好**

四川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的920余支西汉简牍,被初步认定为扁鹊学派医书,价值巨大,可分为《五色脉诊》、《六十病方》等9部人体医书。

四川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和中浚:在《五色脉诊》中有对古人脉搏的描述:人呼吸一次脉动二次为平,脉动三次叫夺精,人呼吸一次脉动四次为夺血,呼吸一次脉动一次为少气。脉搏正常就叫“平”,但在现在认为“一呼一吸脉动4次”才是平脉。这样比较,古人脉搏明显比现代人要慢。按医学考究,一般认为,正常

人脉搏越慢,表明体质越好。

**1984年
张家山汉墓
导引养生术仍可参考**

1984年,湖北江陵(今荆州市)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了一批汉代竹简,其中有两部医学著作《脉书》与《引书》。

著名中医、湖南省中医药大学教授彭坚:《引书》中关于“春生、夏长、秋实、冬藏”的四季养生规律,在今天也仍然有参考价值。比如春天要早起,排尿,洗漱,深呼吸,在庭院散步,归宅后饮水1杯;夏天要经常洗发,早上不睡懒觉,多吃蔬菜;秋、冬要经常洗澡,饮食适当;冬天手要冷足要暖,脸部虽凉但无关,要保持身体温暖,睡眠时要使身体伸直,早上可晚点起。

**1973年
马王堆汉墓
脉象学改写医学史**

1973年,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了一批古医书资料,分

别书写在大小不同的5张帛和200支竹木简上,考古研究人员根据内容命名为《五十二病方》、《养生方》、《杂疗方》、《胎产方》、《脉法》、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等。

著名中医、湖南省中医药大学教授彭坚: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充实、改写了中国医学史。英国医学家特劳伯氏1872年首先提出了“三联音律奔马律”理论。但实际上早在2000多年以前,我国古代的行医者就记录了这种现象。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记载:“搦脉如三人参春,不过三日死。”就是说,按病人的脉象如同3个人配合交替春谷,即脉象快速以三联轴律协调地跳动,这是极其危险的脉象,病人不出三日就会死亡。

**1972年
早滩坡汉墓
多种古方应用于临床**

1972年,在甘肃省武威市早滩坡一座东汉墓穴出土了92枚

简牍,内容都是医方。这些药物大都是以复方成分出现的,一个方剂用药可多达15味。

中华医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副主任委员王振国:这些药方,在现代医学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。以“伤寒逐风方”等为基础方配制的“祛寒逐风合剂”和“清热逐风合剂”,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、类风湿关节炎、痛风等疾病,效果不错;竹简中的“療方”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、支气管炎、乳腺炎等疾病;竹简上的“治东海白水侯所奏方”、“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”等古方,通过灵活加减,可治疗多种疾病。

**1900年
敦煌藏汉墓
失传经典重见天日**

1900年,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偶然发现。幸存文物中有约80部隋唐五代的医药文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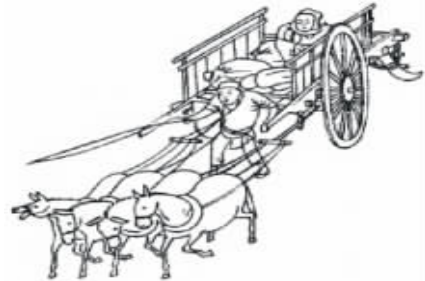
中华医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副主任委员王振国: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医药学经典中,以《本草



今人根据《引书》复原的导引图

集注》《新修本草》《食疗本草》等“本草”类残卷最为著名。这几部著作成书于唐代及唐代以前,但都在宋代就失传了,部分内容能重见天日可谓无价之宝。

上世纪80年代,中国曾掀起一股敦煌医学热。其后,甘肃中医学院专家学者依据敦煌古灸经学,研制出了内病外治、强身健体的系列医疗保健用品,还成立了敦煌医学研究所,从敦煌医学中发现的医方数目超过1000种,实际运用超过了60种。《快乐老人报》2013.12.23文/李仲文



从春节出现那时起,春运现象在古代就存在了,古代过节也有“回家难”。

“回家过年”溯源

为何过年时一定要回家?可能与传说“年”是个恶兽有关。传说,“年”长着四只角四只足,力大无比,在每年的最后一天,即除夕便会出来作祟。当时生产力低下,个体对付“年”的能力不足,人多力量大,于是全家人守在一起,等着“年”的来到,合力把“年”赶走。所以不论怎么困难,有什么样的理由,在外的家庭成员都要赶回,助一臂之力。

为了赶走“年”这个坏东西,在一年的最后一夜——除夕,全家都不敢睡觉——“守岁”风俗由此而来。

古代何时开始过年?

古代中国的“春运”

据中国最早一部释义词典《尔雅》“岁名”条解释,“年”在唐尧时称为“载”、夏代称为“岁”,商代称为“祀”,一直到周代才称为“年”。据此可以推出在周代出现了现代春节的雏形——过年,古代的“春运”也就应该出现在这个时候。

秦代的“高速公路”和“高铁”

解决春运矛盾,根本上是要解决交通问题。在殷商时代,中国古人便十分重视道路交通的建设,在安阳殷墟考古中便发现了大量车马坑。到了秦代,中国的陆路交通水平突飞猛进,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,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公路网,这给“春运”提供了便捷。

据《汉书·贾山传》记载,“秦为驰道於天下……道广五十步,三丈而树,厚筑其外,隐以金椎,树以青松。”驰道是秦国的国道。折算一下,此驰道宽达69米。不只路宽,路旁边还栽植松树,注意绿化降噪,这在当时算是世界第一。

除了驰道,秦时还有直道,轨路等。轨路就是当时的“高铁”。是用硬木做的,下垫枕木,除了工程材料不同外,与现代铁

路基本没有什么区别。马车行驶在上面,速度超快。

古代春运“大巴”——畜力车

陆路交通在古代春运中占有主导地位。随着后期造船技术的日益成熟,水上交通便成了江南和沿河海地区旅客出行的主要方式。

中国不只是最早修筑高速公路和使用轨道交通的国家,还发明了各种运输工具。史料记载在4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就有车了。

在古代,驱车动力主要是人力和畜力。长途运输,特别是物流主要靠畜力车,它是中国古代的大巴。有马车、驴车、骡车、牛车等,其中马车是古代春运最主要的工具,和现代长途大巴一样重要,至今在北方个别地方的路上仍能看到马车。

最后,值得一提的是,现代春运期间会有人做慈善,免费送民工回家过年。在古代也会有善人这样做,送上盘缠,让穷人过年时能与家人团聚。

《百科知识》2014年第2期文/倪方六 荐/丁强

揭秘红军长征胜利关键

靠杨虎城送的密码掌国军动向

从现有资料看,红军长征中,四渡赤水、飞夺泸定桥、突破乌江、奇袭腊子口等一个个成功,其决策依据主要来自截获和破译敌军的空中情报,俗称“空中耳目”。这里记叙的“耳目之功”便是红四方面军电台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贡献。

张国焘曾在《我的回忆》一书中这样写道:“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,是1934年12月间开始的。”“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,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。他们日夜在行进中,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。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,决定行动,发布命令。”

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能够破译敌军的空中情报?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份蒋介石部队所用的密电码。遗憾的是,张国焘为与党中央分庭抗礼,提高个人功绩,隐瞒了杨虎城以及白区地下党的真诚帮助。

1933年初,蒋介石命令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配合川军夹击刚刚进入巴山的红四方面军。杨虎城不愿与红军作战,密派少校参谋武志平出使红军求和。

为促使求和成功,也为红军作些实实在在的贡献,武志平从军部偷出了一份密电码,外加一份军用地图,献给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。

有了这份密电码,红四方面军不断截获川军情报,从而掌握了反围剿作战中的主动权。

更了不起的是,武志平在向傅钟等红军将领呈送这份密电码本时,说这是杨虎城、孙蔚如等陕军将领的一份诚意,这就为两军和谈的天平增添了诚信的砝码。红四方面军立刻派参谋主任徐以新跟随武志平回汉中,于1933年6月1日签订了“共同反蒋抗日”的“汉中新密约”,又称“巴山协定”。

这个协议坚持了将近两年。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,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之众。最终,这支部队成为确保红军长征胜利会师、西路军征战,以及抗日战争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。后来,签订《汉中新密约》的国民党第38军率先加入人民军队。再后来,好几支国民党武装也以此为榜样,相继成为人民军队的成员。

虽然,最后这份密电码消失在了西路军征战的硝烟之中,但它的历史功绩却应为我们后人所永远铭记。

《解放军报》2014.1.15文/李伶

中条山之战,多少中国士兵跳入黄河

1939年夏天,陕西、山西交界处黄河滩上,黄河声咽,热风猎猎。千名陕西士兵与日军肉搏之后,走投无路,不愿受辱,宁愿赴死,纷纷跳入眼前泥汤似的黄河水……这是编撰的传奇故事,还是确有其事?这样一段往事为何被淹没多年?

被有意“忽略”的壮举

1938年7月,蒋介石调集第四集团军东渡黄河,赴山西南部中条山、黄河沿岸狙击日军。日本媒体称,蒋介石此举一石二鸟,一是让这支“杂牌军”守黄河,二来也是消耗这支自己一直有心结的部队。1939年至1941年,陕军在中条山抗战三年,武器落后,后援匮乏,损失惨重,但一直死守阵地,被称为“中条山铁柱”,却很少受到当时政府的嘉奖,也极少登上当年的报端。

“六·六战役”是“中条山抗战”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。经过13天激战,最终,陕军两万多人以牺牲8000人的代价守住了阵地。

“跳黄河”,就发生在战斗过程中,这是未能突围或被逼上绝路的官兵的壮举。

1939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,为鼓舞士气,“胜利”被“放大”,而惨烈的牺牲代价则被有意地“忽略”了。壮烈的陕西士兵跳黄河,在当时就被有意识地“忽视”了。

民间的追问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西北大学老师张恒开始给自己妻子的外祖父杨世伍寻找当年牺牲的“档案”和证明(证明其确系牺牲在抗日战场上),因为当时有风声说,原第四集团军38军的战士因后来起义,可以作为革命烈士对待。他的岳母急切希望能摘掉戴了许多年的“国民党军官家属”帽子。

在给张恒的“牺牲证明”里,一位杨世伍当年的老战友在材料最后提到,在那场惨烈的“六·六战役”中,自己曾经和战友“扑入黄河,免遭被捕受辱”。张恒第一次知道,“还有这事?”后来,他找到了垣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华兴。王华兴家就住在黄河边,“六·六战役”的时候,他八九岁,也听过大人们说“黄河上漂尸体漂了三天三夜”的事,只当一个可怕的传说,后来才知是抗日士兵跳了黄河。

此时,王已掌握了很多资料:那一仗日本人准备得很充分,我们的部队都被打散了,弹尽粮绝。跳黄河的,大多数都是从西安来的“学生兵”。这些学生兵思想进步,但还没上过前线,甚至还没学会打枪,很多人连武器都没有。他们第一次上战场,就被日军分割包围,赤手空拳,走投无路,不愿被俘,于是跳了黄河……

黄河边的记忆

随着“见证人”的增多,张恒渐渐勾画出当年“跳黄河”的详细状况:

1939年6月6日午后,芮城县的老庄村南窑、许家坡、方家村一带大约有一千人跳黄河,主要为96军177师的后勤人员、学兵队。

1939年6月6日午后,陌南镇的马家庄、沙窝渡、曲里的黄河滩和绝崖上,大约有500人扑入黄河或跳下悬崖,主要为96军177师工兵营部分官兵。

1939年6月7日下午,在平陆县张峪村、沙口村、窑头村一带,大约有一千多人的96军177师和38军47旅被围官兵,在黄河滩上手拉手走入黄河,试图渡河逃生,大多数人被黄河波涛吞没。

1939年6月7日黄昏,平陆县老县城一带和太阳渡有500余名38军46旅官兵被日军包围,苦于没有船只,找来桌椅、箱柜、木料、木椽等丢入河水后再跳入黄河,但因黄河浪大流急,大部分人被水浪吞没。余下漂浮的官兵又被追赶而来的日军机枪枪杀。所幸天色渐黑,极少数人因此侥幸生还。

几年来,张恒见过四五位“跳黄河”老战士,全都八九十岁了。想起当年的部队,他们会突然呜呜地哭出来……

《各界》文/张亚利